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山坡地災害之社會心理衝擊：林肯大郡個案分析

The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Impacts of Environmental Disaster: A Case Study of Lincoln Community

計畫編號：NSC 88-26>5-Z-002-045

執行期限：87年8月1日至88年7月31日

主持人：畢恆達 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一、中文摘要

住宅可能是個人發展過程中最重要的空間。它提供個人以安全感和控制感，反映個人的價值觀，並給人連續性與永恆感。本研究企圖以林肯大郡房屋倒塌事件來說明環境災害如何引發個人認同危機、翻轉了家的概念、並改變了家庭關係。

關鍵詞：環境災害、家的意義、地點黏結、自我認同、不確定性

Abstract

A house may be is the most important space for a person's development. It provides with the sense of safety and control, reflects a person's value, and offers a person the continuity and eternity. This paper tries to show how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create identity crisis, the upsetting of the concept of home, changes in family relations and uncertainty as regards the arrangement of home space for the residents.

In 1997, a landslide happened in the Lincoln Community because of the Winnie Typhoon. A row of apartments fell down and 28 residents were killed. Engineers found out later that other buildings beside were built on refilled land and are still sinking unevenly.

A broad definition of self is the sum total of everything called his/her. Among the personal possessions, a house is the most significant. It not only provides people with a shelter, but also fulfils the needs of personal, family, and community activities and leads to place attachment. Landslide endangers victims' value systems. They suspect the

meaning of work. Before the disaster, working can lead to acquire a house in the future. However, now they need to pay the loan of a house that is impossible to live.

Home is a safe place, a symbol of social status, a place for taking a rest after a long day work, and a place to be together with family. For the victims, a house not only loses its function of sheltering, but also becomes a space that residents have to protect. An intimate living space becomes a place which people want to escape. They do not expect to come home. Leaving home does not require a reason, they just want to go out.

A disaster at home also results in the separation or reorganization of a family. A husband stays in the Lincoln Community because it is close to the place where he works. The wife with their children rent a house outside the community for safety. Another family live in three different places: the Lincoln Community, a friend's house, a relative's house. One day on the way to school, the child realized that she forgot to carry her textbooks, but no one knew where she left them.

The home is not only a residential space, it is a field of pre-reflective actions. It provides us with a base to plan our future. It represents and nourishes an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ur self-identity. Even the nomads try to maintain the continuity by the same furniture arrangement, the orientation of the tent, and the ritual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ent. For the people who still stay in the Lincoln Community, they face a lot of uncertainty. They are not sure if another disaster will happen when typhoon or

earthquake comes. This uncertainty results in the confusion of the basic house maintenance and the difficulty to plan their future.

In conclusion, the environmental disasters not only cause the loss of assets but also create the inversion of the meaning of home. The home, which used to be a safe, stable, and controllable space, now becomes a source of danger, a place from which people want to escape. It also results in the reorganization and reflection of family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 person's ability and value system.

Keywords: environmental disaster, meaning of home, place attachment, self-identity, uncertainty

二、緣由與目的

國內近十餘年來，由於環境問題日益嚴重，民間的環境意識也逐漸升高，社會心理學者也逐步對環境意識、反污染自立救濟、環境社會影響評估進行研究。此外，國科會自 1982 年即推動大型的「防災科技研究」計畫，然而在此大型計畫中，計畫之重點仍集中於工程的面向(如氣象防災、地震工程、水災防護等)。而防災的社會經濟層面，則著重在災害的危險度評估、災害預警系統、防災效益評估、救災支援系統等，鮮有對災害發生之後，受災居民之認知與其生活所受之影響加以研究。本研究計畫正是期望彌補此類研究之不足。

本研究計畫以汐止林肯大郡塌陷事件做為研究的對象。第一、社區住宅塌陷為國內外所少見，深具研究價值。第二、林肯大郡事件尚未獲得解決，本研究除了學術研究之外，亦希望對於此事件之解決提供助益。第三、台灣於林肯大郡塌陷之後，又陸續發現其他十幾起山坡地危險社區案例，而且可能還有更多的案例出現。本研究之研究成果可以對於其他案例之協調解決以及受災居民之心理適應有所幫助。

三、文獻回顧

有關家的社會心理意義的研究主要有兩個取向，分別是心理分析與住宅的社會表徵。

(一) 心理分析。非人類環境(non-human environment)並不是佛洛依德心理分析理論的主要興趣。對於佛洛依德而言，人的生活是被社會與人際環境所引導與形塑，物只是性心理的需求與衝突的外在表現。它扮演一個被動的角色。物的內在性質被化約成人或身體的一部份。

Marc (1977)指出嬰兒在母親的子宮裡太舒服了，以至於他不想離開它，並且在出生之後就努力想再回到子宮裡，因此他蓋房子。房子的形式已經藏在人的內在。與其他世界隔離的非洲人，仍保有最原始的生活方式，他們的兒童所畫的房子就傳達他們內在的聲音。當兒童畫房子的時候，他並沒有參考外界的模型。那個房子大致上是對稱的、輪廓並不清楚、基礎差不多是圓形的，其實它就是子宮。當人們建造一間房子時，他就是在創造一個和平、平靜和安全的領域，它是母親子宮的複製。從那裡我們離開世界去傾聽我們內在的韻律，並且創造一個屬於我們自己、免於危險的安全地方。當我們跨過房子的門檻，把門從我們後面關上時，我們就可以和自己成為一體。

Cooper (1974)採用楊格(Jung)的理論架構以解釋住宅的象徵作用，即普遍的集體潛意識聯結人們及其原初，而原型--心理能量的節點--必須藉著象徵向外表現。Cooper 指出住宅是自我的基本象徵。她引用社會科學文獻、文學、詩與夢的分析，以說明居室反映了人們如何正視自己為一個獨立個人以及其與外在世界的關係。Cooper 視家為心理的延伸，經由和物質世界的親密關係，使得人格能夠成熟地成長。

但是如果住宅裡住的是房客、沒有關係的人群、僕人或定期來訪的客人，那又如何？它是誰的自我象徵？大多數人並沒有自己建造房子。房屋做為一種商品，而

且可能已經由陌生人住過幾年，如何能傳達此種象徵？(Saegert, 1985) 此外，住宅不只象徵自我為一獨特的人，也象徵團體認同 (Pratt, 1982)。而 Cooper 有關獨立住宅做為一普遍、不變的象徵形式的論證則只是靜態的描述，忽略了地產商與政府政策在形塑獨立住宅市場所扮演的角色。

(二) 住宅的社會表徵。Chapin (1935) 嘗試利用四個尺度以決定人們的社經地位：文化設備、有效收入、物質資產以及社區活動的參與。他發現只要知道客廳裡的設備與東西就足以判斷一個人的社經地位。然此一分析只顯示客廳的東西與其他指標的相關度，但是以之做為社經地位的指標則落入了定義的循環(Baudrillard, 1981)。

假設客廳反應了人們社會認同的表現，許多研究者(如 Amaturo, Costagliola, & Ragone, 1987; Bonnes, Giuliani, Amoni, & Bernard, 1987; Duncan & Duncan, 1976; Laumann & House, 1970; Pratt, 1982; Weisner & Weibel, 1981)沿用 Veblen(1899)的「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 以及 Goffman (1959)的「前台」(front region)的概念，以研究客廳陳設與社會地位的關係。他們除了關心社經地位的指標，也探討居民的社會與政治態度(Laumann & House, 1970)；他們不只調查居民客廳陳設的清單，也探討其式樣(Laumann & House, 1970)、佈置方式與維護(Amaturo, Costagliola, & Ragone, 1987)。但是由於他們沒有考慮權力結構的社會過程，因此無論其實證之統計關係如何的精密都無法給予我們一幅階層社會的圖像(Baudrillard, 1981)。

Duncan 與 Duncan (1976)探討不同性質的社會地位以及表達社會地位的不同管道與方式。他們比較美國波士頓與印度二地區的傳統與新興社會菁英的家庭消費模式，並且利用社會網絡的可穿透性(impermeability)以解釋此二團體的差別。傳統菁英將錢花在社交活動以表達其社會身份。他們有一個極為緊密的社會網絡，因此可以依賴口語以維持其聲譽。但是新興菁英處於較鬆散的社會網絡，因此需要

較持久可見的證據，例如住宅與裝潢，以重複地向不同的觀眾展示自己的地位，而不致耗盡其資源。

這些研究代表了社會科學裡的一支傳統，認為在現代消費社會裡，表現社會地位是住宅與物的主要意義。然而 McCracken (1987) 發現許多現代北美的中產家庭，利用物以營造家的感覺(homeyness)，做為對抗地位競爭的堡壘。這個居家環境給予人們凝結與滿足感，並使人們遠離對於權勢的永無止境的追求。

Despres (1992) 曾歸納許多經驗研究中居民所提出的家的意義。她指出家的意義包括：1) 家提供安全感與控制；2) 家是個人理想與價值的反映；3) 家是形塑個人的居住環境；4) 家提供永恆與連續性；5) 家是與親友交流的場所；6) 家是活動的中心；7) 家是外在世界的避風港；8) 家是社會地位的象徵；9) 家是一個實質空間；10) 家是一種擁有權。

面對住宅環境的改變，家的意義又會有怎樣的變化呢？本文將以林肯大郡個案來探討。

民國八十六年八月十八日早上，溫妮颱風來襲，位於貢岩、順向坡、而建築物未與山坡保持安全距離的林肯大郡發生擋土牆崩裂，造成一排房屋之柱子斷裂，其一二樓被壓平，而整排大樓則傾斜靠在後面的一排樓房上。總計七十戶房屋全毀，二十餘戶半毀。受災住戶，部分接受短期房租補助、部分由建商安置在社區的十五樓區的空屋內。原來有八九成的住戶，災變發生之後，只剩下二、三成的住戶留下來。

環境災害所造成的衝擊是整體、全面的，包括個人、家庭、社區、政府、企業等不同層級認知、關係的改變。本文並不打算處理造成災變背後的法令制度或執行的問題，也不探討受災居民與媒體、政府關係的衝突與互動，而將焦點放在家的層次。分析住宅這個我們生活中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當它遭到破壞的時候，原來習以為常、視為理所當然、而未在意識中反省的家的意義會有怎樣的改變？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深入訪談為主，共訪問居民 30 人，其中一區 2 人、二區 5 人、三區 10 人、四區 11 人、五區 2 人；男性 8 人、女性 22 人。除了住戶以外也訪問政府官員、專家學者、參與鑑定的技師、法律師、建築師與民意代表。

五、發現與討論

自我認同的危機

一個人的自我(self)就最廣義的界定來說，是他所有可以稱為他的(his/her)的總和，不只是他的身體和精神，也包括他的衣服和房屋....這些東西給他相同的情感。如果它們不斷滋長，他會洋洋得意；如果逐漸衰退，他會感到沮喪(James, 1890)。在人們所擁有的物品當中，房屋可能是就經濟價值而言最昂貴的一件，許多人奮鬥一生為的是要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屋。當然房屋並不只是讓人擁有、可以遮風避雨的地方，它更可能由於人常處其間、完成重要的個人、家庭與社區的活動，進而讓人發展出心理上的黏結(attachment)。這種對家的黏結整合了人的自我界定與認同，而黏結的破壞就可能危及個人的自我界定。房屋以及其他個人所擁有的物品傳達了「我是誰？」的訊息。房屋遭到破壞，例如遭到污染、倒塌，個人的價值也受到影響。

Korosec-Secfaty (1986) 在一個有關遭小偷經驗的研究中指出，被偷竊的事實讓受害者覺得自己是沒有能力的；質疑他掌控生活中事件的能力；進而影響自我認同。自我評價的降低讓他有罪惡感。偷竊尤其讓人對自己做為父母的權威感到自我懷疑。住宅是父母角色展現的主要場所。不只是財產受害，財產所有人也受害。而父母在兒女眼中是一個受害者。林肯大郡的居民所遭受的住屋威脅遠比遭小偷嚴重的多，同樣的，個人的價值認同也會遭到質疑。「我們作父母的就覺得非常的內容，把小孩置身在這樣的環境裡面，造成他們一輩子的遺憾。」

林肯大郡的居民大都是 30 到 40 歲的中產階級居民，他們辛苦打拼，不想寄人籬下，不想搬來搬去，為了尋求生活的安定，找到了這個在經濟上可以負擔得起的住屋，也算完成了人生計畫中的一件大事。但是溫妮颱風摧毀了他們辛苦織起的美夢。這不只是經濟的巨大損失而已，更危及生活的價值。林肯大郡的居民根本質疑辛苦工作的意義何在？過去工作為的是找尋一個安定的家，現在工作的薪水卻要拿去繳交一間已經無法居住的房子的貸款。

住宅本身以及其內的客廳裝潢等，經常是人傳達其社會地位的象徵。山坡地的災害卻讓住屋成為一種污名。過去林肯大郡的居民在社區裡辦活動的時候，還告訴小孩說：「你們是林肯的小孩！」語中傳達了對於社區的認同。現在他們只說住在汐萬路，而迴避林肯大郡的標籤。「我會覺得很丟臉。我去郵局辦定存，我去寫扣繳憑單，汐萬路，人家就問，那你是汐萬路哪裡啊，喔，我就說我們就是林肯大郡，然後大家就都在看你。」「現在搭計程車也不敢說住林肯大郡，人家都會以異樣的眼光看妳。」

自我認同的形成經由一個我們想像他人如何看待我們的過程。林肯大郡的居民不只可能遭受異樣的眼光，也可能面對正面的質疑或是「譴責受害者」的社會壓力。親友可能質問甚或嘲笑：「那種厝你也去買？」面臨這種挑戰，居民必須提出一套解釋來肯定自我。「事情發生之後當然有人放馬後砲。」「有的人說是我們沒有知識。人家那個建設公司的總經理還買三間，還有保險經紀人、律師、立委也都有人在這邊買的啊。」有的林肯大郡的住戶就養成了「我很笨！」的口頭禪，做為自我解嘲的發洩方式。其實他們很清楚知道，「我們沒有錯，如果有，那是錯在我們太相信政府、相信建商。」

家(home)的意義的倒轉(inversion)

我們常說家是安全的堡壘、家是避風港、家是社會地位的象徵、家是親人聚在

一起互相傾吐痛苦與歡笑的地方、家是擺脫工作環境壓力使精神得以鬆弛休息的地方、家是我們的出發點也是我們的終點 (Appleyard, 1979; Despress, 1992)。然而由於山坡地災害，這些家的意義已經逐一失去。家由原本的「避難所」、保衛家人生活與安全的地方，變成是家人要為之抵抗、保護的對象 (Brown & Perkins, 1992)。一個原本日常最親密的生活空間，變成一個讓居民想要逃避卻又是不得不面對的地方。回家不再是期待。家變成是一個想逃離的地方。出去不再有目的，只是為了要出去。

Bachlard (1969) 曾經用森林裡的小屋作為家的原型，即使狂風暴雨來臨，小屋也跟著顫抖，但是屋裡的人知道在屋裡他就是安全的。遮風避雨本來是住屋最基本的功能，然而對於林肯大郡的部分居民卻連這個也受到威脅。颱風來了，政府或親友可能會告訴你最好待在家裡不要出門，因為外面很危險，而家裡是安全的。但是林肯大郡的居民在颱風來臨前卻要趕快「跑到人家家裡逃難」。我們常說家是避風港，這個指的不只是家提供了物理環境的安全，它也是外在險惡的社會環境中一個的安全堡壘，一個可以與親人共享感情的場所。林肯大郡的居民則覺得無法自外於危險的情境。一位居民從外面回家，她表示她是：「剛從北投坐計程車回來，從陳進興的懷抱逃到林肯大郡的懷抱。」由於鑑定報告無法給居民確定安全的訊息，加上居民從日常生活環境中的觀察(例如日益擴大的牆壁裂縫、雨後地面不斷湧出的水)，導致家不但無法保障人的生命安全，反而是危險的來源。「我昨天還做惡夢，夢見我家的窗戶掉下來，我用手扶著窗戶。」「我每天都做惡夢，夢到從懸崖摔下去。」「發生事情後的兩個禮拜內，我們都是穿好衣服睡覺，隨時準備逃難。」

我覺得怕怕的，房子前面就是擋土牆，睡覺時看到天花板上的裂痕，我和我兒子說：我們去睡床底下，他說：「媽，你神經病，床上不睡要睡床底下。」其實我怕的是，颱風來了可以

事先知道，那地震呢？常常睡到一半都會作夢，夢到嚇醒，有時還會尖叫。

下雨還好，我們可以看到，但地震怎麼辦，地震是無形的，跑都來不及跑，因為地下都龜裂的很嚴重。

看到地下室的大樑裂開，以及當初都不曉得地下停車場下面還有一層，現在每天作夢都還會害怕。小孩的情緒也不穩定，有許多東西都是擺在車上，誰知道哪時又會發生什麼事，隨時開車就可以走了。

面對這種危險，仍然居住在林肯大郡的居民就各人發展出預測危險的能力。有的人每天晚上臨睡前都會針對牆壁的裂縫做檢視測量，看看是否有惡化的趨勢。有的人在家裡掛風鈴，用風鈴的聲音來告知地震的存在。一位住戶每逢下雨便會打電話至氣象局詢問雨量，或撐傘感覺雨量，因為永遠記得當天雨水打在傘上的感覺。有的住戶則依賴具有土木專長又是社區組織幹部的鄰居，以他的行動作為安全與否的指標。

..對對對，我每次回來都是看 X 先生窗口，他的窗有亮，我們回來有看見他的燈就覺得安心。是啊，尤其我們家就住 X 先生樓下，我都聽著他家的聲音，他有什麼風吹草動，他一跑，我就跟著跑。

家不再是一個安全而溫暖的地方，而是一個你想逃離的空間。因為「你出去就感覺很好，你一回來感覺就壓力很重。」「以前家是最安全的地方，我都和孩子說，沒事不要在外面晃，回家最安全。現在家變成最危險的地方。」

家(family)的意義的改變

住宅空間的災害也導致家庭成員的分離或重組。一位林肯大郡的居民說，她和她先生現在「過著牛郎織女的日子」。她先生因為上班的關係留在林肯大郡居住，也同時可以看著房子，以免遭小偷。她自己則為了孩子的安全搬到外面居住。有的住戶則是在林肯大郡與親友家之間輪流居

住。於是原來家所提供的穩定、連續性都難以維持；就連日常生活所需的必需品，都找不到定位。「東西丟三落四，我女兒的東西就分三地放，一旦忘了帶東西，都不知道東西在哪裡？車上也有，娘家也有。」有一天她女兒上學途中發現國文課本忘了帶，但是沒有人知道課本放在哪一個「家」。

家本來是人們在外工作、就學、遊玩之後，期待歸去與家人團聚的地方。由於發生災害之後，住宅空間成為危險的來源，於是大人寧願放棄與小孩團聚的溫暖，反而鼓勵小孩子在外逗留。

小孩子還好，但現在我都叫他們沒事不要回家，在家裡最不安全了。但小孩子會說：那外面有陳進興怎麼辦？外面也不安全。我告訴他們，陳進興只有一個，外面人那麼多，比較不會輪到你，但家裡就都裂了，就比較危險。

現在他們放學喔，我都叫他們留在學校唸書，不然就去同學家。我那個大兒子愛打電動，以前我都怕他不回家，在外面會變壞，現在寧願他學壞也不要他壓死，對不對？

經歷過環境災害帶來或健康或生命的威脅，有些居民重新思考家庭成員之間的關係，因而體認到過去視為理所當然的存在其實是應該加以珍惜的。

我們只有一個女兒，本來想說留一間房子給她，沒想到發生這種事。我們現在只能多多帶她出國玩，只能留給她一些無形資產，一方面家人也能多聚聚。

以前都是小孩睡一間，夫妻睡一間。她跟我講說，乾脆睡一間，要死也要死在一起，不要分開睡。

不過處在環境災害所帶來的強大生活與心理壓力之下，如果夫妻之間對於應付災害的方式沒有共識的話，也經常導致關係的惡化。例如家庭成員間，有的認為應該「積極加入災戶組織工作，希望付出自己的努力可以得到公義的回應」，有的卻認為「升斗小民難以與強大的政府對抗，

唯有盡快趁著年輕多賺一點錢，再買第二幢房子才是應該做的方向」。有的想「搬回去住」，有的卻認為「搬回去住正好給政府對外說沒有危險的藉口，就更不容易要政府來處理災後的爛攤子」。如果沒有良性的溝通，尋求相互的理解並形成共識，嚴重的時候可能就導致家庭關係的破裂。

不確定性：時間/空間秩序

家不只是一個居住的空間，也提供我們時間上的認同。在家裡，一切東西與空間的安排都是非常熟悉的，日復一日的處身於這個環境之中，它變成是理所當然無庸置疑的。Seamon (1979)指出空間變成是一個植基於身體之中的前反思行動的場域 (field of pre-reflective actions)。即使是深夜裡沒有燈光，我們還是可以用身體去感覺環境，知道家具的所在，在房間裡行走。每天晚上我們事情做到一半沒有完成，我們知道明天早上起床之後，就可以繼續，不必一切從頭再來。離開家到一個陌生環境裡，我們要時時提高警覺、要去適應環境，可是在家裡我們可以放鬆、感到安全與連續性。家也提供一個穩定的基礎讓我們可以安排未來。它不只是個人自我認同的再現，也孕育了認同成長的環境。自我認同的成長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而不是靜態自我意象的反映；它需要一個允許現在與未來、經驗與想像互動的可能。知道我們可以安居在一個地方而又有能力改變它，讓我們可以建立未來的夢想(Dovey, 1985)。所以人與家的黏結(attachment)也不是靜態的存在，它是一個過程；透過不斷發展的事件，我們維繫了與環境的關係。變換家具的位置或者重新裝潢，改變了環境，但是仍然維持甚至可能加強了我們與家的黏結。如果人們無法改變環境來支持其所慾望的認同或目標，則這個黏結就可能消退。但是如果環境受到外界力量的衝擊或破壞，以致於居住者必須花費非常大的心力去維持其生命的連續與穩定，則個人的認同也可能受到傷害(Brown & Perkins, 1992)。

家一方面需要長時間經營來建立個人與家的黏結，同時家也許諾了未來認同的發展空間。一個因為工作或其他外在因素而必須經常遷移的人，很難對一個地點發展安全而穩定的黏結關係。即使是遷移頻繁的游牧民族也會藉著同樣的家具安排方式、帳篷的方位以及豎立帳篷所舉行的儀式以維持連續性。對於習慣於在空間中定居的人來說，住屋不像是日常用品可以來來去去。就像一位林肯大郡的居民所說：「房子是一輩子的事。」當政府告訴他們鑑定的結果是「目前安全無虞」的時候，他們要問，什麼叫做目前，是一天、一個月還是一年？有的居民受迫於經濟的壓力，仍然住在原來的家裡，也有人暫時居住在建商提供的大樓區的房子。但是他們同樣遭遇的是對於住屋未來的不確定性。颱風或者地震再來的時候，林肯大郡會不會再發生災變？建商允許他們暫住大樓區到何時？這種對於未來的不確定，導致住戶連基本的住屋維持都感到困惑。「我家很亂，已經沒心情整理。」「現在回到家裡都比較不喜歡整理，好像有沒有整理都無所謂。」「對我們家來說不安定真的是很方便，以後要怎麼做，現在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到底要怎麼安排比較好。」

台灣過去有關環境災害的經驗研究，大都著重在工程的面向(如氣象防災、地震工程、水災防護等)。而防災的社會經濟層面，則著重在災害的危險度評估、災害預警系統、防災效益評估、救災支援系統等，鮮有對災害發生之後，受災居民之認知與其生活所受之影響加以研究。而有關家庭的經驗研究關心的是婚姻與親子關係、家庭決策、婚姻暴力等議題，大部分研究都沒有處理住宅空間的使用與意義。本文企圖連結環境災害與家的研究，從環境變遷的觀點來看家的意義的轉變。從林肯大郡的個案中，可以發現環境災害帶來的影響不僅僅只是財產的損失，更是家的意義的倒轉。家本來是一個安全、穩定、連續、具有控制力的場所，現在卻變成一個危險的來源、一個居民想要逃離的空間。伴隨而來的影響，則是家庭關係的重

新組織與反省，以及對個人能力與工作價值的根本挑戰。

六、參考文獻

- Amauro, E., Costagliola, S., & Ragone, G. (1987). Furnishing and status attribut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living room.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9(2), 228-249.
- Appleyard, D., (1979). Home. *Architectural Association Quarterly*, 11(3), 4-20.
- Bachelard, G. (1969). *The poetics of space*. New York: Beacon Press.
- Baudrillard, J. (1981). *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St. Louis: Telos Press.
- Bonnes, M., Giulian, M. V., Amoni, F., & Bernard, Y. (1987). Cross-cultural rules for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living room.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9(2), 204-227.
- Brown, B. B., & Perkins, D. D. (1992). Disruptions in place attachment. In I. Altman & S. M. Low (Eds.), *Place attachment. Human behavior and environment: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Vol. 12). (pp. 279-304). New York: Plenum Press.
- Chapin, F. S. (1935). A measurement of social status.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institution*. New York: Harper.
- Cooper, C. (1974). The house as symbol of the self. In J. Lang, C. Burnette, W. Moleski, & D. Vachon (Eds.), *Designing for human behavior* (pp. 130-146). Stroudsburg, PA: Dowden, Hutchinson, & Ross.
- Despres, C. (1992). The meaning and experience of home in shared housing. In Giuliani, M. V. (Ed.). *Home: Social, temporal, and spatial aspects* (pp. 53-56). San Giuliano Milanese, Italy: Progetto Finalizzato Edilizia.
- Dovey, K. (1985). Home and homelessness", In I. Altman & C. M. Werner (Eds.). *Home environments* (pp. 33-64), New York: Plenum Press.

- Duncan, J. S., & Duncan, N. G. (1976). Housing as presentation of self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al networks. In G. T. Moore & R. G. Golledge (Eds.), *Environmental knowing* (pp. 247-253). Stroudsburg, PA: Dowden, Hutchinson & Ross.
- Giuliani, M. V. (Ed.). (1992). *Home: Social, temporal, and spatial aspects*. San Giuliano Milanese, Italy: Progetto Finalizzato Edilizia.
- Goffman, E. (1959).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nchor Books.
- Hayward, D. G. (1975). Home as an environmental and psychological concept. *Landscape*, 20(1), 2-9.
- James, W. (1890).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 (Vol. 1). New York: Macmillan.
- Korosec-Serfaty, P., & Bolitt, D. (1986). Dwelling and the experience of burglary.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6, 329-344.
- Kron, J. (1983). *Home-psych: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home*. New York: Potter.
- Laumann, E. O., & House, J. S. (1970). Living room styles and social attributes: The patterning of material artifacts in a modern urban community.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54, 321-342.
- Marc, D. (1977). *Psychology of the house* (J. Wood, Tran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 McCracken, G. (1987). "Homeyness": *Culture made material in the modern north American home*. Working paper No. 87-105. Guelph, Ontario, Canada: University of Guelph.
- Pratt, G. (1982). The house as an expression of social worlds. In J. S. Duncan (Ed.), *Housing and identity: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s* (pp. 135-180). New York: Holmes & Meier.
- Rubinstein, N. J. (1993). *There's no place like "home": Home as "trauma": The lessons of the unspoke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24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Environmental Design Research Association.
- Saegert, S. (1985). The role of housing in the experience of dwelling. In I. Altman & C. M. Werner (Eds.), *Home environments* (pp. 287-309). New York: Plenum Press.
- Seamon, D. (1979). *A geography of the lifeworld*. New York: St. Martin's.
- Veblen, T. (1899).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New York: Macmillan.
- Weisner, T. S., & Weibel, J. C. (1981). Home environment and lifestyles in California. *Environment and Behavior*, 13, 417-460.